

用“麦克风”易,开“挖掘机”难

春节前后,网络谣言趁机传播的事实也从侧面证明,在新的媒体环境中,自媒体依然不能替代坚守专业精神的传统媒体。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做专业的事,在信息传播领域也是如此。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近日,两则“网传”新闻相继被辟谣。2月13日,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名网民发微博,说从今年起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结婚证得交5000块钱的“二胎保证金”。这条微博发出之后,引起很多议论,也有其他地方的网民跟帖表示“确有其事”。为此,《人民日报》记者在多地进行了调查采访,却未曾发现一例“二胎保证金”事件,那些言之凿凿的网民既没有亲身经历,也无收费凭据。2月14日,网上又爆出济南某大学一名男生在

情人节向单身女教师表白被拒,在马路上裸身打滚。后经媒体证实,此事发生在河北保定,当事人为中年男子,事发原因也非求爱遭拒,而是精神异常。

两条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网络传言之所以迅速成为舆论热点,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击中了公众的兴奋点,结婚竟然要交“二胎保证金”,大学男生向单身女教师表白被拒后“裸滚”,这些谣言在新闻淡季里“适时而生”,马上就引起了轰动。春节期间,还有一些语焉不详的新闻在网上广泛流传,比如上海女孩跟江西男友回家过年,因为一顿晚餐引发情感危机,连夜返回上海。这些新闻的共同点都是“网传”,涉及的人和事都似是而非,

缺少细节和证据,从专业的角度看就是新闻要素不全。

这些缺少事实依据的“网传”,原本不应该引起这么多的议论,因为“网传”一旦被辟谣或逆转,很多滔滔不绝的评论马上成了毫无价值的“口水”。在舆论场里,真相远比一些高谈阔论的“真理”更可贵,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在没有任何真实依据时,信口批评民政部门乱收费,或者感慨高校学生心理危机严重,做起来很容易,听上去也很有道理,但是最怕真相来“打脸”。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人都有了“麦克风”,难免会有人用歪曲事实的方式哗众取宠。春节期间的这几例“网传”再次证明,在网络上越是

“奇葩”的谣言,越容易得到广泛传播。在网上闻风而动,不辨真假的传播和议论未经证实的信息,说到底是一种非理性的表达习惯,稍有不慎就损害了他人的名誉和权利,更严重的还可以引起社会的动荡。

春节前后,网络谣言趁机传播的事实也从侧面证明,在新的媒体环境中,自媒体依然不能替代坚守专业精神的传统媒体。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做专业的事,在信息传播领域也是如此。当很多自媒体在谣言之前竞争谁的“麦克风”分贝更高时,是专业的媒体人用专业的调查方式挖掘出了真相,让谣言像泡沫一样迅速破碎,他们的价值已经不言而喻。

“标”都不治,难怪号贩子“敬业”

■公民论坛

□王传涛

春节刚过,刚刚遭重拳打击的医院号贩子死灰复燃。北大口腔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妇产医院……15日,记者走访多家医院发现,号贩子们准点“上班”了,而且明目张胆,不避保安。不少医院的号贩子甚至分工明确,有的在门口招揽“生意”,有的则组织人手在院内排队,形成了贩号“流水线”。(2月16日新华网)

北京各大医院号贩子之所以如此猖獗,有深层次的原因,不合理的医疗卫生体制,自然是病灶所在。可是谈及改革,就总显得太远太久,难不成在“摸石头”过程中,还要继续纵容号贩子们存在下去?眼下,最见效的办法,仍然是被冠以“只治标”的严厉打击。

说到依法打击,公安等执法机关并不像传说中所讲的那样“无能为力”,依法打击医院号贩子至少有以下两个依据。一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应当根据情节进行拘留和罚款的处罚;二是刑法中也

有适用于打击医院号贩子的“口袋”,比如“扰乱公共秩序罪”就是一个可供参考的罪名。

事实也证明,春节之前北京警方开展的打击号贩子行动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抓了十几名号贩子后,许多号贩子都很快躲入了“老鼠洞”。但是,我国的一些执法活动,往往过度依赖于“专项整治”、“集中整治”,而缺少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手段,这也是春节过后号贩子再次冒头的环境因素之一。

打击号贩子,更要打击医院的“内鬼”。医院号贩子如此猖獗,除了号贩子本身的原因之外,医院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利用职务和职权与号贩子勾结进行牟利——这也是公安机关可以继续进行调查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医院的保安、医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专家号贩卖过程中有寻租及其他不法行为,完全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进行处罚。要知道,号贩子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只是一个“售票员”的角色。

谁都知道滋生号贩子的病灶到底在哪里,但清理病灶,进行改革的同时,永远不能忽略了执法打击这种“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从这个层面上讲,“治标”就是为了“治本”,过分强调“治本”的难度而忽略了“治标”,是假治而不是真治。

别拿“文化”为“持枪照”开脱

■媒体视点

有消息称,一名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杭州倪姓留学生,因在社交网络上张贴持枪照,并暗示如果考试挂科将让教授体会一下“恐惧”,被学校认为是危险人物,签证取消,返回中国。此事引发关注之后,当事人小倪却透过媒体称,他并没有被校方开除;倪父对其子的行为更是轻描淡写,只承认“确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原因还是还在“逐步学习当地的法律、适应当地的文化”。言下之意,张贴持枪照威胁教授,这只是美国的法律和文化要禁止的事情。

很多人抱怨中国缺乏言论自由,但在某些方面,中国人的公共表达却自由得令人咋舌,譬如在网上谩骂甚至威胁他人,一些网民不只是口无遮拦,简直就是肆无忌惮。他们不忌惮,主要还是因为相当多的国人把谩骂与威胁引入了“言论自由”的范畴,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是被明确禁止的。谩骂行为有可能造成对他人的人格损毁和侮辱,威胁行为则是对威胁对象有可能实施具体伤害或侵害行为的第一步骤。这跟单纯的言论已然无关,跟所谓

言论自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每每出现类似情况,就有人呼吁健全法制。其实我们的法律对谩骂和威胁他人的行为,并非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范及罚则,但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上却“蔚为壮观”且鲜见警方出手呢?而另一方面,假如谩骂和威胁的对象属于比较“重要”的人物、机构乃至某些抽象的东西,为什么有关部门就会迅速行动予以查处呢?

这说明,一般的谩骂和威胁,囿于种种主观方面的因素,并没有进入有关部门的法眼。或许是因为警力有限,或许是因为“没造成实际伤害”,或许是因为我们需要“营造”一种“自由的言说氛围”……再加上一些人缺乏法律意识,于是“骂人自由”乃至“威胁自由”在中国也差不多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由此看来,小倪需要“适应当地的文化”,倒也有些道理。但是,在网上公开张贴持枪照威胁自己的教授,若挂科就要杀人,这样的行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已远远超出了“文化”范畴,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怎么还好意思拿“文化”开脱?(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朱达志)

尊重不愿“卖地”的农民

□莫开伟

中国的城镇化,对农村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这变化的背后,部分农民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态度,也开始转变。2016年春节期间,6个年龄加起来接近500岁的江苏农民异口同声地说:不想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有36位农民联名申明不希望土地被卖,希望保留土地经营权,请政府在周围协调给他们补地。以往遇到征地纠纷,多是与补偿金多少有关,这次却是不同的。(2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看到这则新闻,颇感意外,同时也令人眼前一亮。因为这些农民不愿失地的举动,与当前许多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千方百计想把自己土地卖掉、从而获得巨额土地补偿款,是截然相反的。在笔者看来,不愿失地的愿望是好事而非坏事,它既体现了农民朴素的土地情怀,更折射了农民土地意识的觉醒,懂得了土地在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是任何金钱所无法代替的道理。

这么看待农民不愿失地之举,并非曲意逢迎,更不是有意要与各级政府抬杠,因为过去城镇化建设只顾给农民征地补偿款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一些是地方政府为了获取巨额土地收益,在征地过程中千方百计压价,农民所得难以承担未来生活支出。

二是政府没有按规定提取农民失地后相应的失业、医疗等风险补偿基金,农民失地之后出现意外,承受风险的能力降低,失去了生存之本。对此,江苏不愿失地的农民就认

为:“如果土地上交,表面上看是得到了政府的一笔钱,不过钱没有了可以再挣,但土地(经营权)没有了就永远没有了。”

三是政府对征地实行的大都是一锤子买卖,对失地农民再就业缺乏足够引导,也未提供相应就业出路,缺乏技能的农民很难找到就业门路,必然坐吃山空;而且失地农民后代就业更是一个普遍难题。因此,江苏不愿失地农民认为:“即使我的小孩将来在城市混不下去了,至少回农村还有点地可种,解决温饱,可如果连地都没有了,那就彻底什么都没有了。”尤其当一些农民获得巨额土地补偿款之后,生活缺乏周密安排,吃喝赌嫖、大肆挥霍的不在少数,真到了哪一天生活没了着落,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隐患。

而且更为令人揪心的是,不少失地农民并非愿意“上楼”,他们依然渴望自然的田园生活,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往往忽略了农民对土地的这份情怀及对自然生活的向往,强行征地,将大量农民“赶上楼”,让他们被迫成为市民。这里不妨再听听江苏一位老农民的话:“过去考大学进城或通过各种关系得到的城市户口,和现在用钱买房子获得的城市户口,是不一样的……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我都不想用地换房子换钱,也不想进城市,更不想住高楼。”这些话值得深思。

显然,部分农民不愿失地的愿望,当地政府要尊重,更要正确对待民意及其合理诉求,绝不能熟视无睹。随着粗放城镇化带来的城市病症不断暴露,不愿失地农民会不断增多,对于各级政府来说,这是不容忽视的挑战。

部分。弘扬主旋律、传输正能量固然旗帜鲜明,也需注意方式方法,自上而下的引导必不可少,呵护培育多样化生态也不可或缺。

在国际上,电影的发展有种逆势而上的统计特征,也就是在经济暂时低迷的时候,电影市场往往非常活跃。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喜剧类电影票房的一家独大,仍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一种反应,而不能仅用“娱乐化”来解释。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可能比较悲观,喜剧可以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欢乐,而且消费成本也相对较低。

■本版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一语中的

很多返乡人群对农村及其发展趋势不太了解,一旦把个案扩大或延伸解读,就很容易给人印象是中国农村毫无希望了。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陈锋表示,不同的人返乡,可能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农村,每个人返乡基本都是个案呈现,甚至有些看法比较极端,但观察中国农村需要有整体视野。比如有的村庄显得很凋零,背后是相当多村民有了进城安居的实力。

精明的企业主在影视作品中嵌入“软广告”时,会反复琢磨,广泛取证,务求处理得当,妥帖自然,让观众不知不觉亲近了产品。

在专栏作家王啸看来,无论古今中外,主旋律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都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



本报地址
济南冻源大街2号

邮编
250014

传真 (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 (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 (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 (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ilwb



齐鲁晚报微信
qiluwbanbao002